

(八)倘越南不幸為北越吞噬，菲、泰、新等國相繼承認共匪，則共匪與我在歐、亞兩洲之外交爭奪戰便面臨一新階段，此時共匪對我之策略，在無法使用軍事力量進犯台灣之大前提下，必將澈底發動對我之經濟戰，其重點必

將針對台灣之工業結構、生產弱點及全世界市場情況，挾其利用奴工生產之廉價產品，運用其與各國有利之外交關係，極力破壞我之對外貿易，以達到其在經濟上窒息我國民生之陰謀！

(九)美國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在軍事上共匪尚不致成為強敵，美國亦認為匪俄雙方許多基本利益尖銳對立，匪俄之間的仇視敵對，決非短時間可以獲致和解，因此，美國乃利用俄、匪間之矛盾，企圖聯匪以制俄，或者至少可以分化匪俄關係，不使匪俄重新成為團結統一的共產集團。共匪亦認為其

真正的頭號敵人為蘇俄，而非美國，為了要打倒其最可怕的頭號敵人，不得不先拉攏其次要敵人，所以說美、匪關係之突破，完全是互相利用，但中華民國之存在，實為美、匪關係進一步改善之重大障礙。美國基於對我政府之條約承諾，台灣在太平洋所居重要之戰略地位以及對其經濟利益之重大影響，決不讓台灣為共匪所攫奪，何況日、俄為本身的安危，對台灣之關切，亦決不亞於美國。

今後我中華民國應妥善把握國際形勢的演變，莊敬自強，團結奮發，以開創反共復國的新機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卅一日稿

日美俄毛關係與亞洲局勢

朱少先

在日本支持的日本共產黨「暴力革命」遭到失敗；一九五八年中共直接對金門地區的炮戰又被遏阻；使蘇俄與中共對東北亞地區的武裝赤化工作，完全失敗。因此，使蘇俄與中共，不得不作策略上轉變，由「武裝鬥爭」修改為偽裝「和平統戰」——即在各國組織統一戰線，實施滲透、顛覆工作。一九六〇年日本因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所引起的「安保騷動」，幾乎推翻保守政府，及同年四月韓國李承晚政府因選舉舞弊而引起「學生革命」，推翻李承晚政府等等，無不與共產滲透、顛覆活動有直接、間接關係。

由於中、日、韓三國，同受共產主義威脅，雖然三國所處政治環境容有不同，遭遇亦有區別，在反共策略上、方法上，可能亦有若干差異；但因反共基本立場完全一致，且彼此間均有安危與共、唇齒相依關係，非圖團結，不足於抵禦中共與蘇俄各個擊破的共同認識；因此三國尙能相互支援合作。尤其在一九六四年中共實施原子試爆之後，其對外侵略企圖，更加明顯：

由蘇俄與中共所策動的韓戰——赤化大韓民國的陰謀無法得逞；由中共

日美俄毛關係與亞洲局勢

所以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日韓三國關係，最為密切。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韓兩國簽訂了「中韓友好條約」，及一九六六年朴正熙總統親訪台北，與蔣總統會談，進一步加強了中韓兩國關係。一九六五年日韓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填補了亞洲反共防線上的最大缺口；同時由於日本給與韓國有償、無償經濟援助，使韓國經濟建設有了迅速發展，加強了韓國的力量。一九六七年佐藤榮作首相又專程分訪中、韓兩國，交換加強合作意見。一九六六年六月又在漢城召開了包括中、日、韓、菲、泰、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澳洲等九國外長會議，並成立了「亞太理事會（ASPAC）」，成爲一個經常性的區域組織。該理事會表面上雖僅標榜經濟、文化合作，但實際上，其政治色彩與反共色彩都非常濃厚。

此外，中日韓三國之間，係以美國爲中心而互相结合。因中美之間訂有「中美防禦條約」；日美之間締有「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而韓國與美國之間，亦有「韓美防衛條約」；美國對這些亞洲國家，均負責防衛上義務，故實際上三國之間，以美國爲核心，透過彼此間的雙邊條約關係，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東北亞防衛體系，對中共形成包圍勢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森總統與佐藤首相在華府舉行首腦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已更清楚的證實了中、日、韓、美防衛關係的存在。「聯合聲明」中說：

「總理大臣與總統，特別注意到朝鮮半島緊張狀態的依舊存在。總理大臣對聯合國爲維持朝鮮半島和平所作努力的評價甚高，並表示韓國的安全，對日本本身安全極爲重要。總理大臣與總統，一致期待中共在對外關係上採取更合作和更具建設性態度。總統曾言及美國對中華民國條約上義務，並表示美國遵守此項條約承諾。總理大臣表示，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極重要因素。」

佐藤首相不僅在「聯合聲明」中有上述明白表示，在會談後於「全美記者俱樂部」午餐會發表演說時，更作了具體的闡明。他說：

「……如果韓國受到武力攻擊時，對日本安全將受到重大影響。因此，萬一韓國遭受武裝攻擊時，美軍對付此種情勢，不得不使用日本國

內設施及基地作戰鬥作戰行動前進基地時，日本政府基於上項認識，在實施事前協議①時，決將採取積極而且迅速的態度。」

「維持台灣地區和平爲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本人對美國決定履行對中華民國條約上義務十分重視。萬一不幸台灣受到外來武力攻擊，實際上不得不發動義務時，因此項情勢，可視為威脅包括日本在內遠東和平與安全。因此，美國履行對台灣防衛義務時，就日本而言，基於上項國家利益之認識，自應採取適當對策。」

從以上聲明與演說，一方面說明了日本已接受美國政府以交還琉球爲交換條件，取得日本分担對韓國及中華民國防衛的承諾。一方面，完成了以美國爲核心的一個中、日、韓、美的東北亞防衛體系。

在此項聯合聲明發表後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華社」透過北平廣播，對日美會談，作了一次猛烈的攻擊。它說：

「……陷於內外交困的美帝國主義將驅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充當急先鋒，爲美帝在亞洲更加瘋狂地進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

「尼克森和佐藤在華盛頓三天密謀中，進一步策劃在軍事上的勾結，並且讓日本爲美國在亞洲進行的軍事冒險承擔更大的軍事義務。」

「……爲了策劃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戰爭，尼克森和佐藤會談中着重談了加強日美安保條約的體系，妄圖把這個條約變成範圍更大的軍事同盟。……爲滿足美帝要求，佐藤不僅同意美帝可以繼續根據這個條約使用日本基地，而且表示日本軍國主義將直接參加美帝發動的戰爭，甚至妄圖染指『中國』的神聖領土。佐藤狂妄地叫嚷，南韓朴正熙傀儡集團的安全，對於日本自己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②

二 尼克森訪問大陸後亞洲情勢的演變

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華府會談」之前，尼克森總統在同年七月二十一五日曾在關島發表了「新亞洲政策」的談話，它的主要內容包括了下列三點：

(一) 中共正在發展它的核子實力，北韓與北越都走好戰路線。在本世紀結束前，會構成大戰危險。為消除此一危險，美國將支持亞洲非共國家的防衛團結，但不提供武裝部隊，以避免另一類似越戰的發生。

(二) 美國將信守對亞洲國家的條約承諾。但關於各國的安全問題，除受某大國核子武器威脅外，美國將鼓勵並期望各國自行處理。

(三) 當美國對亞洲減少其軍事援助與軍事人員時，將繼續給予經濟援助。

美國為執行這個新政策，在日美「華府會談」中，才使日本作出了「韓國條款」與「台灣條款」的承諾，促成了「非共國家防衛團結」；並開始在越南及韓國撤退美軍。在此同時，英國也宣佈了在一九七一年以前撤退蘇聯士以東的英國軍隊。由於英美兩國前項措施，使亞洲原有圍堵中共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也給予蘇俄與中共有可乘之機。蘇俄首先提出了「亞洲集體安全保障構想」，蘇俄「真理報」指出這個構想，是為了適應英軍撤離亞洲及越戰結束後的亞洲新情勢。它強調「這個構想與帝國主義者軍事結構完全不同，而是用以對抗在亞洲的侵略勢力，並且是保障亞洲各國安全的。」^④

蘇俄此一構想，旨在迫使英美軍隊撤離亞洲後，形成非武裝中立地帶，好讓蘇俄獨霸亞洲，一面結合亞洲國家，包围中共。

中共為了對抗蘇俄的包圍及中、日、韓、美的防衛團結，除了加強與北韓勾結外，積極展開對日美兩國的笑臉攻勢。而首先下手的目標是美國。透過所謂「乒乓外交」，與美國搭上關係，進而竟一反過去謾罵「美國帝國主義」是最大的敵人的姿態，邀請尼克森訪問北平。

美國雖然明知與中共間的基本矛盾無法解決；但爲了早日擺脫越戰和對抗蘇俄，妄求維持國際均勢，竟未與有關盟國商量，決定接受邀請，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宣佈定期訪問中國大陸。此一驚人消息，不僅震撼了亞洲自由國家，也動搖這些國家的反共信心。使國際姑息氣氛，籠罩全亞洲乃至全世界。尤其在日本，親共的左翼勢力要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壓力，愈來愈大。

當時日本已是經濟大國，其國民總生產僅次於美國與蘇俄佔世界第三位

， 在亞洲乃至世界已有舉足輕重地位。不過日本始終站在自由陣營一邊，與自由世界團結合作。但自尼克森決定訪問中共之後，它的立場就發生動搖。中共也立刻對日本展開了笑臉攻勢，先派王曉雲訪日，繼之王國權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也到了東京，展開拉攏、滲透活動。前者是中共對日統戰機構「中日友好協會」祕書長，後者爲該會副會長，對日本情況熟悉，且多知交。兩者訪日後，不但日本有力政治、經濟團體，即相繼訪問中共，一時「日中（共）關係正常化」運動，也到達了高潮。

蘇俄爲了對抗美國與中共勾搭，又恐日本投向中共懷抱，亦開始對日本發動外交攻勢。一時使日本成爲蘇俄與中共爭取對象。葛羅米柯外長是一九七二年一月到日本訪問，與福田外相舉行第二次「日俄外長會談」^⑤，並獲得了加強兩國經濟文化關係、兩國總理互訪及在該年內開始和約談判等協議。其後因田中內閣於同年九月與中共建交，使兩國關係再趨冷淡，原已獲得的各項協議，亦未能實現。

至於日本與美國關係，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可謂水乳交融，非常密切；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雙方在貿易上發生了磨擦，在一九六九年之前，日本對美國貿易，一向是入超國，但到了一九六九年一轉而爲出超十四億美元，一九七〇年也出超十二億美元。因此，引起了美國的注意。但該時美國對外貿易總額，尙能維持出超，故對日本除在一九六九年第七次「日美經濟貿易聯合委員會」中提出檢討，要求日本平衡貿易逆差外，尙未採取具體行動。但進入一九七一年之後，情況逐漸嚴重，至同年六月底，美國貿易收支，出現了七十八年來第一次逆差，而且數額高達四十九億八千萬美元，其中對日本貿易逆差最大。由於此一情勢之發生，尼克森除了在七月十五日宣佈定期訪問中國大陸已給與日本政治上一大震撼外，八月十六日又公佈了八項「新經濟措施」^⑥。其中徵收一〇%進口附加稅，對日本影響最大。因日本對外貿易，三分之一係輸往美國，美國徵收附加稅結果日本負擔加重自可想見。結果逼使日本在同年十二月實施日元升值。但該年年底，日本對美出口仍有三十二億美元。因此來自美國的壓力也愈來愈大。

由於日美兩國經濟關係的惡化，使雙方在政治關係上，亦發生不協調現象。尤其是對中共外交，尼克森決定訪問北平之前，既未能履行過去諾言與日本作事前協商，在經濟上又加重對日本壓力，使日本政府對美國起了極大

反感。因此田中角榮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接任日本首相後，即以擺脫美國羈絆姿態，於同年九月親訪北平，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美國對日本躁急行事，固有不滿，但亦無法阻止。我們從田中訪北平前在檀香山與尼克森舉行會談後返東京答覆記者詢問時，曾暗示尼克森未支持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且表示遺憾，及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國務院立刻重申履行對中華民國條約義務兩點觀察，說明當時日美兩國對中共政策，頗有距離。也顯示了兩國在政治關係上也陷入了低潮。

因為日本與中共建交，不但未獲得實際利益，反在國際上招致了蘇俄的不滿與攻擊，且喪失了亞洲自由國家的信任；來自美國的經濟上、政治上壓力，有增無減。在國內又受到自民黨內右翼及反共勢力的批評與指責，該年十二月衆議員大選，自民黨又慘遭挫敗，使田中政府基礎發生動搖。田中爲鞏固政權，對內安撫反共勢力，對外再強調日美關係重要性並主張繼續維持日美安保條約，一面還派佐藤前首相、大平外相及田中本人親自訪美，與尼克森晤談，來彌補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不過這些作爲，最後田中內閣仍難逃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辭職的命運。

雖然田中內閣的原因非常複雜，但田中欲擺脫美國羈絆，搶先與中共建交，實爲最重要因素。而且，造成今天亞洲混亂局面及中南半島的危機，實與日本與中共建交有密切關聯。不過，追根究底，最後仍應歸罪於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及一九七二年的訪問北平後所產生的結果。

三 中共對日美策略轉變的目的

世人皆知中共一直謾罵美國是「帝國主義」，是「中共最大的敵人」；

對於日本，至少在田中執政（一九七二年七月）之前，中共指自民黨保守政府是「反動政權」，尤其在佐藤執政期間（一九六四—一九七二）被中共指爲「最反動政府」、「美帝附庸」、「軍國主義者」。但一九七二年二月，中共當局却邀請了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繼之於同年九月，也把田中首相請到了北平。中共這一連串在外交上的突然轉變，究竟其目的何在，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我們初步的判斷，中共這樣做，不外：（1）突破「文化大革命」後的外交孤立形勢；（2）突破蘇俄的包圍；（3）破壞中日韓美所聯成的東北亞

防衛體系。但這些決不意味着中共政策上有何轉變，而僅僅是一項策略上的運用。下面擷引用中共一項機密資料加以說明。

該項中共祕密資料，是「人民解放軍」於一九七三年四月所頒發，由「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印後發至連以上部隊，對幹部進行所謂「形勢教育」的一項文件。此項資料經由中國情報機構獲得，已由本所譯成英文連同原件印刷成冊，定名爲：“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提供各界人士參考。該項資料彌足珍貴。

正如中共「解放軍」當局所指出「這次路線形勢教育，不是一般的時事政策教育，而是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再教育。」^⑦它的內容所涉及範圍甚廣，本文僅就「越、高停戰協定」、「邀請尼克森、田中訪問中國大陸」部份，加以引證說明。

（1）對於「越、高停戰協定」的簽訂，中共認爲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鼓勵了「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加深了蘇俄與美國的矛盾。它又說：「越南停戰後，美軍撤走，它在亞洲的一些走狗都惶惶不安。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統治者看到美國呆不住了，都想和我們（中共）拉關係。這些國家原來跟定美國，現在也動搖起來了，這種動搖利於我們開展工作。」^⑧中共又認爲「越南停戰，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新的鬥爭開始。」它說：「停戰以後還面臨着兩種可能：（1）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實現和平統一越南；（2）和平方式不行，阮文紹首先動武，最後戰爭解決問題。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歷史經驗看，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不大，還需要用戰爭解決問題。」^⑨

今天東南亞的局面及越南、高棉所遭受的命運，就是和中共所預料了完全一樣，是中共一手導演而成。

（2）關於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北平，它說是：「從毛澤東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策略思想出發的。並不是在外交路線上有所什麼變化。」中共指出「美帝」與蘇修都是主要的敵人，都是要打倒的目標，但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毛澤東看準了問題，抓準了矛盾，運用乒乓外交，邀請了尼克森。毛澤東此項戰略決策，具有四項意義：（1）打亂蘇修的戰略部署；（2）加劇美俄的矛盾；（3）加劇美帝和它亞洲國家的矛盾；（4）有利解放台灣」。^⑩

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問北平的結果，事實上獲得了甚多預期效果，也因此

讓中共混入了聯合國。上節所述亞洲情勢的劇變，就是受中共與美國勾搭的影響。

(三)關於邀請田中訪問北平，中共自己說：「邀請田中訪華同邀請尼克森一樣，第一是着眼於人民，通過上層接觸，打開到日本人民中去做革命工作，支持日本人民起來革命；第二是利用日蘇、日美的矛盾。」又說：「日本戰略位置很重要，美帝、蘇修要發動侵略中國戰爭，都必須拉日本充打手。美國利用日本作跳板，對中國實行月形包圍；蘇俄把日本作為橋頭堡，拉日本參加它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對我國（中共）實行圓形戰略包圍。此外，日本與台灣關係密切，對其他亞洲國家有一定的影響力。我們（中共）決定與日本建交，粉碎了美帝、蘇修的戰略包圍陰謀，有利解放台灣及改善與東南亞國家關係。而且和日本建交後，增加了日本對美蘇討價還價的資本，這樣日美、日蘇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我們又可繼續利用矛盾，做好工作。」^⑪這裏可以說明中共與日本建交主要目標，是要破壞中日韓美的東北亞防衛體系及粉碎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保障構想和赤化日本。

根據以上所引述的這些中共對幹部「形勢教育」資料，充分說明了中共對美國的「和解」及與日本的「建交」，決非其外交政策的改變，而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它赤化亞洲乃至赤化世界的基本方針，絕對沒有改變。

再從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去年在聯合國資源特別委員會演說中，曾把世界劃分為三部份，蘇俄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為「第一世界」，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介乎兩者之間的日本、加拿大及歐洲國家為「第二世界」。中共自稱是第三世界，它今後的外交策略是爭取「第三世界」，拉攏「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但對付美俄兩國，也有先後之分，先是「聯美抗蘇」，一旦蘇俄倒下了，第二個目標就是美國。至於拉攏日本，第一個目標破壞日蘇關係，這次中共與日本談判簽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時，堅持在條文內列入「反對第三國在亞洲建立霸權」，及自民黨前幹事長保利茂訪問北平時，周恩來強調日美關係應該加強等等，其目標顯然是先聯合美國，來對付蘇俄。但同樣的，一旦日蘇關係對立後，第二步便是要拆散日美關係，取銷「日美安保條約」及撤退美軍，這是無需多所解釋的。

目前的亞洲乃至國際形勢，正如周恩來說的是天下大亂。他在中共「十全大會」中說：「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緩和是暫時的、表

面的現象，大亂還將繼續下去。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喚醒了人民，推動國際形勢進一步朝着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⑫ 緜合以上資料，充分說明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亞洲局勢的突變，完全是由於中共想突破「中日韓美在東北亞的集體防衛」和破壞蘇俄所提倡的「亞洲集體安全保障體系」，亦即中共自己所說的為粉碎「美帝對中共的月形包圍」和「蘇修對中共的圓形戰略包圍」而決定邀請尼克森和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大陸後所產生的結果。

由於尼克森的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出現了美國與中共的「和解」局面。蘇俄受此刺激，除了對與美國停滯的限制戰略核子武器談判（SALT）採取妥協戰術外，積極展開了外交攻勢，先與埃及、西德簽訂「友好條約」，緩和了對歐洲及中東方面情勢，而將其重點移向亞洲，同一九七二年八月葛羅米柯訪問印度，與印度締結了「印蘇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結果造成了十一月的印巴之戰，建立了孟加拉國，使蘇俄在印度洋勢力又獲得了進展；十月包戈尼訪問河內，加強了蘇俄與北越的關係；翌（一九七二）年一月葛羅米柯又親訪日本，企圖拉緊日本，對抗美國與中共的接近。

另一方面尼克森訪問中共之後不久，即訪問了莫斯科，簽訂了有關「SALT」的過渡性協定及其他經濟貿易協定^⑬，重建了美俄協調體制。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月底，尼克森又邀請了佐藤首相在聖克里門舉行高層會談及同年八月又與田中首相在檀香山舉行日美會談。先後兩次會談目的，除了協調兩國對中共、蘇俄政策外，主要在加強兩國關係，不讓日本脫離美日同盟關係。

從中共發動對美日的笑臉攻勢到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日本與中共建交，美蘇的簽訂「SALT」過渡協定，使以日本為中心的包括美國、蘇俄、中共在東北亞的國際政治結構，形成了複雜、微妙的關係；這種關係仍是流動的，易變的，充滿了危機的。中共正利用這些矛盾，來推行它的赤化工作。

綜合以上的分析，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以美國為核心，領導着反共自由國家，遏阻共產勢力向外伸張，加以蘇俄與中共自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起發生相互對立及中共內部情勢的不穩定，整個亞洲，尙能維持着小康局面。但進入一九七〇年之後，因美國「尼克森主義」的出現及中共在對外策略上的轉變，造成了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日本與中共建交，動搖了亞洲自由國家的反共信心與破壞了反共團結。目前大部份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南半島情勢惡化之後，對領導自由世界美國的信心已發生動搖，它們雖然對內採取反共政策，但對外却欲與共產國家接近，以求自保。例如日本、馬來西亞雖與中共建交，但其政府仍採取反共政策；泰國、菲律賓等其基本政策反共，但仍與中共建交打算；韓國政府堅決反共，且一向與北韓勢不兩立，不過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却與北韓發表共同聲明，開始統一和談。此等國家，認為只要政府堅持反共，與共產國家交往，不會影響本身安全。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想法，將會使人失望，而最後遭到赤化的危險。我們從上節中共「教育形勢」文件及最近中南半島的失敗，不難找到結論。

目前亞洲局勢雖然混亂，但所以尙能維持均衡局面的原因，不外靠下列六項因素：

(一) 美俄、美「中」之間尚能維持緩和緊張政策。

(二) 中共與蘇俄間對立情勢依然存在。

(三) 日本與美國間的合作關係良好。

(四) 蘇俄與中共對日本經濟力量評價甚高，認為日本能够成為他們在經濟上的積極夥伴，必須加以爭取，形成對峙局面。

(五) 中韓兩國有堅決的反共意志與自衛力量。

(六) 美國、蘇俄、中共三者均各面臨重大的國內問題，不欲在國外發生重大糾紛。

在此種情勢下，日本所處的地位最為重要，如果日本在緊張的「中」蘇對立關係中，過份傾向中共或蘇俄任一方面，或者日本與美國間合作關係發生重大改變，勢將引起上述維持亞洲均勢各項因素的劇烈變化，而形成不可想像的緊張局面。

因為日本經濟力量強大，蘇俄與中共都在運用各種手段，爭取日本成為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伙伴來打擊對方，而中共與日本的建交已搶先了蘇俄一步

。現在中共又正與日本談判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為了打擊蘇俄，堅持要把「反對第三國在亞洲建立霸權」，明文列入條約之內，雖然未指明國家名稱，但在目前情勢下自係以蘇俄為對象。日本對此已表示無法接受，蘇俄也極力從側面加以阻止。(4)除非中共讓步，此項「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恐難於簽成。

至於上述維持亞洲均勢的其他因素，也不是十分穩定的，隨時有發生變化可能。尤其是第一、二兩項因素，其可變性極大。就第一項而言，美俄的「和解」在有效遏制中共的核子攻擊和相互限制核子戰略武器方面，有其共同的利害關係，但在兩國的基本立場上仍是相反的，不可能獲得真正「和解」，而且中共也隨時準備瓦解美俄的「和解」。至於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雙方為對付蘇俄一點上尚稱一致，其他則甚難舉出共同利害的存在。周恩來在今年二月「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時，曾坦白承認「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因此，這個「和解」也是不可靠的。第二項中共與蘇俄間對立關係，目前雖無變化可能，但一旦毛澤東死後的情況如何，論者就有甚多的推測。總之，美國、蘇俄、中共三者之間，其基本立場完全不同，利害亦不一致，所謂「接近」、「和解」，均屬暫時性的，隨時有變化的可能。一旦這些因素發生變化，亞洲均勢就很難維持。

在上述情勢下，欲保持亞洲長期安定，是極為困難的。尤其是中共滲入國際社會之後，其變化更難於捉摸。一九七一年中共混入聯合國後的情勢，便是最好的例證。所以要謀求亞洲的真正和平與安定，最有效的辦法，只有亞洲自由國家堅強團結，配合美國西太平洋防衛計劃，始能遏制共產勢力的擴張而免遭赤化危險。至於美國的西太平洋防衛構想，係從日本經韓國、台灣、菲律賓向南延伸到新加坡一連串海島前進基地所構成的「列島線防衛構想」，這條防衛線，即是美國西太平洋防衛的第一線。此項構想在尼克森訪問北平及日本與中共建交之後，依然沒有變更。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福特總統訪問日、韓兩國與田中首相及朴正熙總統分別會談時，亦均強調了兩國對亞太地區和平安全的重要性。顯示日韓兩國，仍是美國全球性戰略中西太平洋防線中的重要環節。本(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美國斯勒辛格在國會所提出的「國防報告」中，對東北亞部份也特別強調了日本的安全與東北亞和平對國際安定的重要性。他並指出琉球與菲律賓兩個防衛據點是韓國後方

防衛的支援基地。斯勒辛格說：「從琉球、菲律賓兩據點，可廣範圍的導入陸上部隊、海軍及戰術空軍。並可與夏威夷、加里福尼亞、華盛頓等美國本土三州待機中的後方戰力相結合。」美國這種「縱深戰略構想」，亦已充分說明了它的西太平洋防線，仍以中、日、韓、菲為基幹。再從本（四）月十四日福特總統在國會發表「外交演說」中，也強調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是維持廣大亞太地區安定的基石，與韓國的相互防衛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有同樣重要。這都足以說明美國西太平洋戰略構想，迄未變更。

台灣地理位置，適在美國自日本到新加坡「列島線防衛構想」的中央部份，不僅是琉球、菲律賓的屏障，也是日本、韓國的支援基地，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一環節。福特去年十一月未訪問中華民國及斯勒辛格「國防報告」與最近福特「外交報告」未提到台灣，似係基於對中共關係的政治考慮，應該不難理解的。^⑯

中共對赤化亞洲乃至赤化世界計劃，從上述中共「形勢教育」文件中，已暴露無遺。亞洲自由國家，應該提高警覺，尤其要記取中南半島臨赤化危機的教訓，速謀自救。放棄與中共謀和的幻想，恢復對美國的信心，加強團結，否則便會遭到被各個擊破的危險，最後難逃赤化命運。

一九七五、四、一五、脫稿

註①根據一九六〇年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六條換文規定，在日本美國駐軍遇有重大調整或裝備有重大改變時，雙方應舉行「事前協議」。

註②摘錄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華社北平廣播。

註③一九六七年中共「文革」高潮時，與北韓關係趨於惡化，雙方曾撤回駐在大使，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中共主動派玄峻極為駐北韓大使，不久北韓亦派李雲川為駐北平大使。

註④見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真理報」。

註⑤一九六七年三木武夫訪問莫斯科時，曾舉行第一次「日俄外長會談」，並約定此後每年分別輪流在兩國首都召開定期外長會談；但一九六八年起日本雖多次邀請蘇俄外長訪日，舉行第二次會談，因領土問題，始終未繼續舉行，直到尼克森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後，葛羅米柯才主動赴東京訪問。

註⑥○美元與黃金暫行停止兌換。○實施一〇%進口附加稅。○凍結工業物價九十天。○恢復投資減稅制，第一年一〇%，以後每年五%。○向國

會提出廢止汽車消費稅（七%）。○提早一年實施個人所得減稅。○削減國聯邦政府支出四十七億美元（一九七一年）。○削減對外援助一〇%。
註⑦見「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第一五五頁。

註⑧見同上第一六五頁。

註⑨見同上第一六六頁。

註⑩見同上第一七八至一八一頁。

註⑪見同上第一八一至一八二頁。

註⑫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全大會」政治報告中發言，今年在「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亦有類似的演說。

註⑬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簽訂。

註⑭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蘇俄駐日大使特洛耶諾夫斯基訪問自民黨椎名副總裁，直接告以不必急於與中共簽訂和約；五日復訪問有田外務審議官，作同樣勸告。二月十三日，又以布里茲涅夫親筆函面呈三木首相，要求在日俄簽訂「和約」前，先締結「友好親善條約」。蘇俄大使此項行動，無疑在牽制日本與中共簽約。

註⑮據美聯社華盛頓十六日電稱：「福特總統今天在答覆美國報紙編輯

人協會詢問時證實，美國重視並將繼續關切中華民國的安全與穩定。」

本所出版匪情叢書

一、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二、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三、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匪黨問題論集

五、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探源

六、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七、中共的文藝整風

四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六十元